

出版工作七十年



方厚植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出版工作七十年



方厚枢



商務印書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版工作七十年 / 方厚枢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 - 7 - 100 - 11156 - 0

I. ①出… II. ①方… III. ①出版工作—中国—文集
IV. ①G23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564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责任编辑:张稷 郭悦

出版工作七十年

方厚枢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156 -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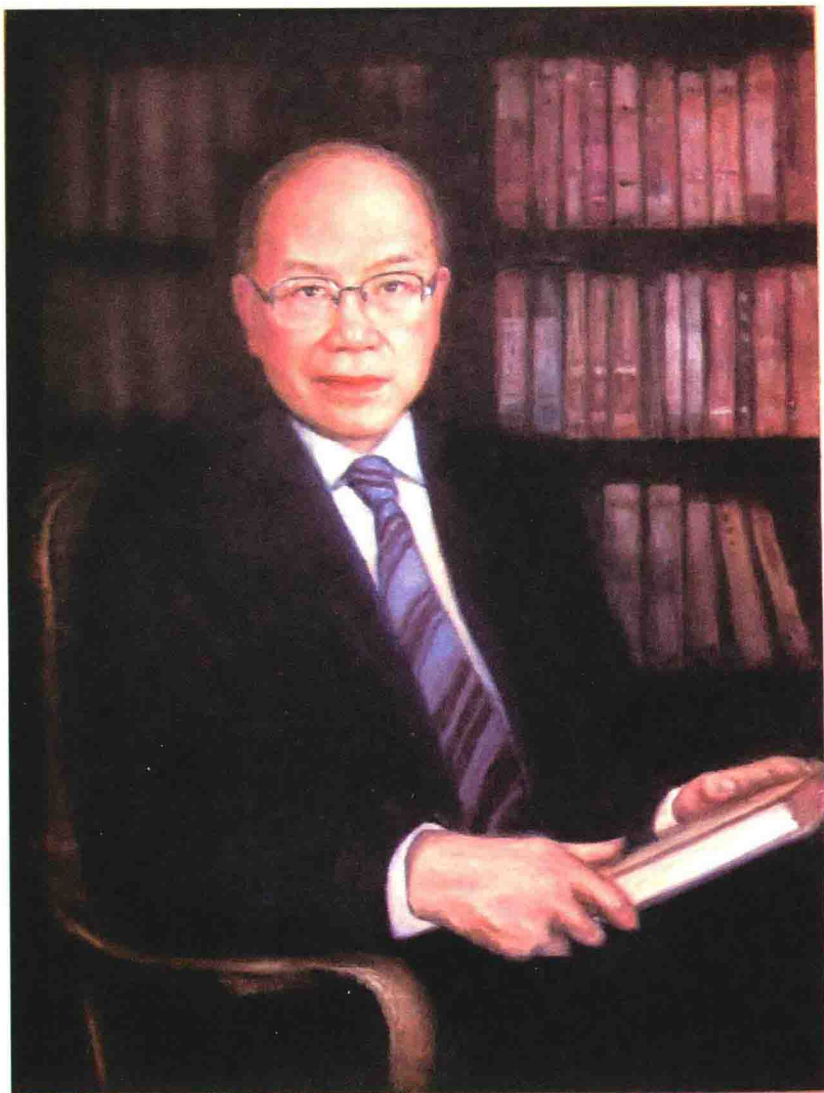
2015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2 插页 2

定价: 1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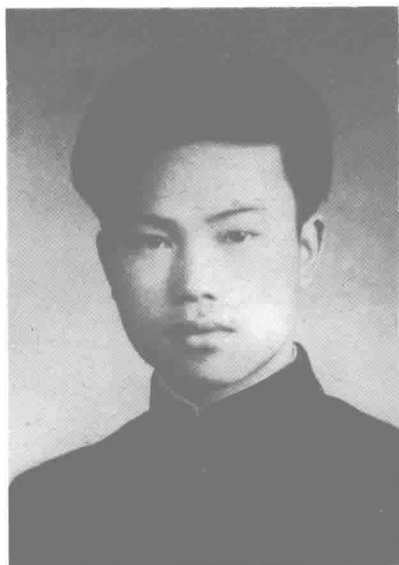
方厚枢 85 岁画像（油画，方群 2012 年 4 月绘）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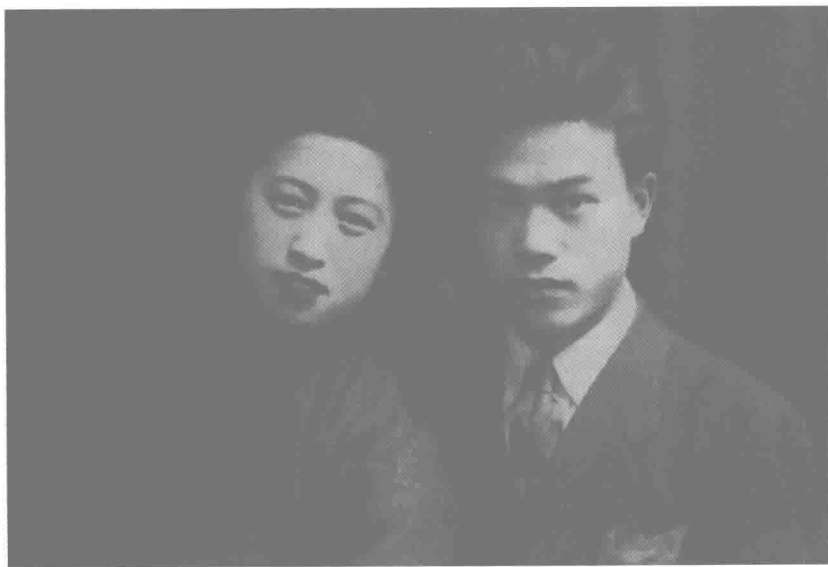
方厚枢（1927年—2014年），安徽巢湖人。

1943年4月进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为练习生，半年后任职员。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等出版发行单位工作。1980年后，历任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出版年鉴》主编等职。1952年11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91年10月1日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为发展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表彰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方厚枢多年从事中国出版史研究，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出版学科及《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两书编委暨“中国出版史”分支学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副主编及多卷执行主编；高校专业教材《中国编辑出版史》中的当代部分主编之一，《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主笔（负责两书1949年至1979年各章撰稿）；担任《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40卷中的“出版学科”主编。出版有《中国出版史话》（前野昭吉曾将本书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出版史话新编》。



1943年4月10日，初入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当练习生。



1946年4月，与程绍琴在安徽芜湖的结婚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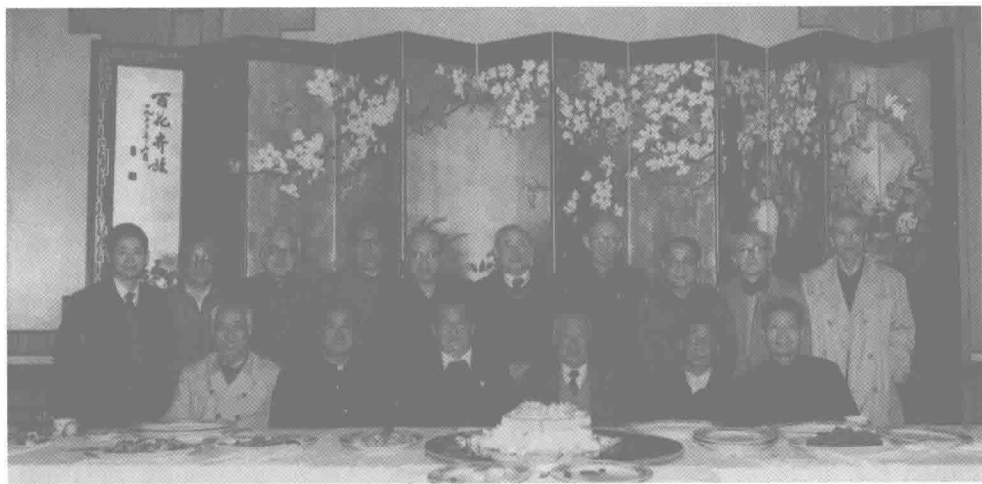
1961年9月，与大哥方唯若在北京合影。



1997年4月8日，70岁诞辰时全家合影。



1978年9月,《汉语大词典》编写小组组长陈翰伯(前排左二)在安徽黄山出席大词典第三次编写工作会议。图为会议工作人员攀登黄山始信峰顶时的合影。(前排左一为方厚枢。)



1990年4月,《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江苏省扬州市举行。会议期间,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在西园宾馆设宴祝贺《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先生、《汉语大词典》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云先生、副主任陈立人先生80岁寿辰(前排右侧三人)。图为寿宴上的合影。(后排左五为方厚枢。)



1982 年访英期间，宋原放副团长（右三）向李约瑟博士（右二）赠送上海古籍出版社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国科技史探索》（国际版）。右四为鲁桂珍博士。（左二为方厚枢。）



1982 年 11 月，中国出版代表团一行 10 人访问英国。图为代表团部分团员在伦敦马克思墓前的合影。（前排左三为方厚枢。）



1983年6月15日，中宣部出版局、文化部出版局在安徽省合肥市联合召开《中国地理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会议。会后从浙江返京。图为（左起）方厚枢、刘果、许力以、杨瑞平、伍杰在杭州六和塔下合影。



1989年8月22日，与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副馆长吴燕美女士（右一）、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戈定瑜女士在北京合影。两位馆长每逢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都前来采购我国新出的年鉴和地方志。



1992年3月13日，应邀在北京大学年鉴编辑培训班开学典礼上介绍全国年鉴编辑出版工作概况。
图为北京大学校领导、年鉴研究会主要领导与全体学员合影。（前排左七为方厚枢。）



2000年11月24日,《中国出版年鉴》创刊20周年座谈会。新闻出版总署、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新老领导及年鉴界专家等40余人出席。图为(左起)方厚枢、卢玉忆、邬书林、许力以、宋木文、石峰、陈为江、王仿子、倪子明在座谈会上合影。



2001年6月27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北京市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在京郊举办首都出版界老同志座谈会。图为全体老同志与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左九为方厚枢。)

序

一位出版史家的成长路径

方厚枢¹

一位出版史家的成长路径，是指方厚枢此著上编的主题；我在这里所说，仅仅是读后的一些感言。

在本书上编最后一页，为响应商务印书馆的倡议，写完并交出《出版工作七十年》书稿后，由于自己的健康状况，跨入86岁高龄的方厚枢同志，满怀深情地说：“我的出版研究和写作生涯，就此画上句号了。”但是我想，老方的学术研究与写作并未终结，而这提前画出的句号，仍能成为他在出版史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就的一个标志。耄耋之年的老方，定会带着更大的喜悦来过好成功者更高龄的晚年。

我知道方厚枢其名五十多年了，而知其名又识其人则是他到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和研究室工作之后，迄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他被称为“活字典”“资料库”和“老黄牛”（指其精神而非年岁）。从建国到新时期的几十年里，凡出版的事，只要问他，他都能说出准确的情况，提供翔实的资料。而对于他经手的工作，无论自己分管的，领导交办的，同事委托的，单位求助的，他都能不辞辛劳、不事张扬地做好，使领导放心，同事满意。他是在完成任

¹ 本文作者曾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代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三届主席，中国版权研究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等职。

务中不忘收集积累资料，结合工作任务又不忘进行研究的。他似乎无时不在收集资料，无时不在进行研究。他对辞书的研究、年鉴的研究、出版史的研究，都是“边学边干边研究”，是在完成任务中铸就的专门家。我是从他的工作和为人中知其名而识其人的。这种从实践中识人，也有助我在实践中待人用人。

老方在本书中回顾了同我相处的若干事，其中有两件值得在这里一提。

一件事，1987年申报副编审职称，他因考虑学历仅是“初中肄业”，未评过“编辑”，英语也只识几个字母和会说少量单词，很是担心能否评上，而其结果却被破格评为“编审”。他说他心中这个“谜团”，直到二十五年后看了我在《出版史料》（2012年第2期）发表《编选“文革”出版史应保留历史原貌》一文才被解开。我在此文的“题记”中说：“1927年出生，从商务印书馆练习生做起的方厚枢，是靠自学成才和工作实践积累而成为有突出贡献的出版史研究专家。1987年6月，我任编辑出版专业高评委主任时，经我提议，全体评委通过，破格评定了方厚枢的编审职称（无正规学历，未经副编审阶梯）。”那时，我和评委都认为，对于方厚枢这样的在实践中拼搏出来并成就突出的专业工作者，只要在诸多主要方面具备条件，就可以突破学历、外语、逐级晋升的限制，破格晋升为编审。此点被我视之为识人用人之道，故在方厚枢负责的一本“文革”史料集子中，特意点明了此事。

另一件事，1991年11月20日，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证书仪式。因是以国务院名义颁发证书，是本部门首批，又多是出版界声誉很高的老专家，如王子野、王益、严文井、韦君宜、秦兆阳、楼适夷、王仰晨、蒋路、戴文葆、林穗芳、邵宇、姜维朴、沈鹏、陈原、吴泽炎、李侃、赵守俨、傅璇琮、金常政、常君实、黎章民、郑德琛、董维良、谢燕声等。我们党组研究决定采取座谈会形式，由我主持会议，刘杲、卢玉忆向在座各位分送证书。在27位获此殊荣者中的王子野和王益，因时在国家机关任职，不在颁发范围，经我征得党组其他同志同意，按专业任职经历、学识水平和实际贡献，以特例入选。此种事只要不为自己搞“例外”，胆子就大了些。同王子野、王益情况相似的许力以，因调到中宣部工作，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此外还有3人。即：人民出版社时任副编审的白以坦，因校对《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无一差错而被称为“校对王”；荣宝斋王大山（无高级专业职称），因

鉴定古字画和现代名人字画善辨真伪而享誉京城书画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审方厚枢，长期在国家出版机关工作，因自学成才，有“活字典”和“资料库”美称，并在辞书、年鉴和出版史研究中成绩突出，而同其他老专家们一同名列第一批。白、王、方三人，与其他入选的名作家、名评论家、名编辑家、名书法家、名教授、名翻译家不同，是因有特殊技艺、做出特殊贡献，而成为我们党组的特殊选项。方厚枢在书中对这次政府特殊津贴颁发仪式做了客观介绍，虽不可能评论我们党组的特殊选项，却准确地引出了我在会上的讲话（参见本书26页）和27位获此殊荣者名单，由此我才想起说出了那“特殊选项”的一番话，又一次起到了“资料库”的作用。

方厚枢七十年的出版生涯，可分为在职的“前五十年”（1943年至1993年）和退休以后的“后二十年”（1993年至2013年）。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他至今发表的500多篇、520多万字研究文稿中的大部分都是1993年退休后写出的。而他一生中最重要最具标志性的出版史研究成果，大部分也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他承担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负责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巨著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的《绪论》、第一至第七章（1949年至1979年）和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大事记》三个部分的撰稿工作。就是说，《中国出版通史》最后一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从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的出版史，外加《绪论》即导言与概说，以及从1949年至2007年这五十八年之大事简录，都出自方厚枢之手笔。这三十年中的1977年、1978年，多被党史国史著作以“两年徘徊”简化处理，而方厚枢却“以亲身经历”专门写了《拨乱反正时期的出版事业》一章，内容翔实可靠。我作为亲历者，也甚为赞成。

这一切都表明，方厚枢退休后的二十年，是他研究工作卓有成效、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的二十年。

方厚枢说他退休后做的那些事，是在发挥“余热”。这样的说法我不敢苟同。是尽职尽责，还是无职尽责，好像都不准确。我力求说出我的理解。我觉得是他参加人民出版事业后长期养成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拼搏精神的“惯性发力”，也是他在党组织生活中经久磨炼的全局观念、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在特定任务中的“自觉践行”。试想他为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国出版通史》之“共和国卷”所付出的拼搏精神，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

序

版史分支所做的不懈努力，为《中国出版史话》以至“新编”出版而精心撰稿，那么，我所评论的“惯性发力”与“自觉践行”两句，似乎还算靠谱。而这也是方厚枢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方厚枢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共产党员和出版史家。现在正当酷暑。此时我读方著又写序文，只是想表达我对其人的敬意，其书的祝贺。以上意见，如有不当，欢迎批评。

2013年7月26日

目 录

上编 出版工作七十年

第一章 从卖书、宣传书到管理书的经历	3
一、从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的练习生起步	3
二、从事编辑工作的启蒙时期	7
三、革新书籍宣传工作的设想与实践	8
四、从新华书店调至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	13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历	15
第三章 改革发展新时期的若干经历	23
第四章 从事出版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	30
一、辞书研究	30
二、年鉴研究	32
三、中国出版史研究	33
第五章 尾声	44